

导论：

诗 学 正 义 ——中西诗学命名问题思考

从当下中西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角度看，首要之事就是对现有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中国古代传统诗学理论中一些重要的核心术语概念重新进行梳理，同时对这些与传统的术语相关联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再思考和重新阐释。这也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努力有密切的联系。站在中学立场上看，中西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或诗学的若干术语概念的清理，从中筛选出一些能够融通中西诗学或文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基本核心概念。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当代中西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有效理论体系的建构。实际上，这一探索自中西方文学或诗学的交流开始起就一直在开展，但真正有效的理论体系迄今仍未建立起来。从总体上讲，我们过去的比较诗学研究存在的许多矛盾和困惑均源自于我们的理论基点上。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的重新认识和清理，还是中西诗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二者基本上是在现代理论话语形态下开展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用以阐释传统文论的现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基本上是在全盘引入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

的。时至今日，这一套理论话语已经体系化地进入到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它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和诗学研究领域，而且还普遍地作用于我们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辨识。这一结果的严重性在于，当某一种，或更多的基本原理性的概念，自动性地成为支配着我们认识、接受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潜在理论思维定势时，我们所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便只能可悲地成为这种既定的理论话语结构支配之下的意义复制。

这一结果已经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我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许多基础性的概念和范畴的清理和重新认识上。如果要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立场的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我们必须对目前在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文学发展史论著中被广泛使用的若干文学批评理论术语进行重新清理，考察这些理论概念在阐述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普适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找到不同文化语境当中产生出来的文学艺术理论之间的共同点和比较研究的平台。

找到真正的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切入点的关键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的重新梳理，这在近几年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的分歧和争议也十分突出。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与争执的产生也是中国古代传统诗学研究中所产生的现代性弊端。它所涉及的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许多深层次理论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甚至已经动摇到中西比较文论，或比较诗学的学科命名，甚至于这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必要的深入探讨。

作为一个学科的命名，中西比较诗学一直被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看成是一个自明性的问题。而在今天，它也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中西诗学的学科命名问题最先提出疑问的是余虹

教授。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中，他直接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现代理论意义上的“诗学”存在，并指出，所谓比较诗学的概念只适合用于西方文化共同语境下的欧美国家的文学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余虹对中西比较诗学的质疑和否定引发了人们对中西比较诗学，乃至中国古代文论诸多根本性问题的再思考，也产生了诸多的争执。这些争执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目前中西方比较诗学或文论的学科的理论基点是否成立？中西诗学或文论可以纳入比较研究或探讨的真问题究竟是什么？余虹的基本结论是，中西诗学在基本范畴和概念上截然相悖，且不可通约，所以二者之间的融通是难以实现的。要指出中西文论或诗学之间的差异并不难，因为和任何事物间的关系一样，差异总是绝对的。中西方诗学理论在形态上的差异更是十分明显。而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寻求二者之间的融通才是我们进行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最终目标和最大难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就是一件求同存异的理论难题。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追求的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才可能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中西传统诗学的同质性或异质性问题的讨论带来的基本问题的实质是，比较诗学应该从何处去寻找贯通中西的基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就目前所争论的某些基本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澄清，以确立我们的中西文论或诗学比较理论研究的合法性。西方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通过二者间差异性的研究完全可能寻找到二者间的相互交流与融通的基点。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一书中认为：“研究诗学，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文化传统，无论其多复杂、微妙和丰富都只是对单一的某一概念世界的考察。考察它类的诗学体系本质上就是要探究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对文学的各种可能性作出充分的探讨，作这样的比较是为了确立那些众多的诗学

世界的原则和联系。”^①从他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西方学者在中西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的巨大进步。西方学者在进行比较诗学研究当中也逐渐意识到，只有站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比较研究的立场上，才可能建立起具有包容文学各种可能性的全面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今天，西方哲学和诗学理论研究均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中西方哲学和诗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寻找走出理论困境的一条路径。“别求新声于异邦”，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和借鉴来建设和更新自身理论，自古皆然。无论是从东方文化或是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上看，这一研究立场自古皆然。在现代西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家，无论是叔本华、海德格尔或是德里达，都曾经从异质性文化中寻求到了理论发展的资源和动力。

因此，就今天的中西比较诗学或比较文论来说，理论上的互补性是中西方共同寻求的目标。多数致力于比较研究的中外学者对于通过对二者间的理论上的比较研究同样充满美好的憧憬。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便设想出了建构跨文化比较诗学的理论目标。他说：“比较文化传统不同的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的思考或许可以揭示出哪些概念具有普遍意义，哪些概念只适用于某些文化传统，哪些概念又只是属于某一特定传统。这反过来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什么特征是为所有语言所具有的。什么又只为某一种特定文化所独有，因为批评的概念是以实实在在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因而对众多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会有助于获得对所有文学有一个更好的理解。”^②对中西比较

①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②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页，译文转引自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诗学的研究的热忱和期许，表明多数中西方学者试图通过比较诗学研究，最终建立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跨文化的诗学或文学批评理论。应该说，这样的目标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实现，但只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以西方理论对话语权的全面掌握的方式来单向性地完成的。

所以，要真正地实现这样的目标远非易事。从比较文学或文论的角度上看，西方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仍然十分地陌生和不理解。如果说，在早期的西方学者当中，即使是像莱布尼兹那样，对中国文化思想有浓厚兴趣的西方学者对汉学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程度上的误读和隔膜。除此之外，相当大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持非常傲慢与自信态度的西方学者中，黑格尔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蔑视和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武断式评价表明，一方面，他和多数的西方学者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知之甚少；二则是受困于他的哲学妄断。相比之下，受其哲学影响甚深的 19 世纪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则显得更加小心和信心不足。在他的《美学史》一书的前言中，鲍桑葵在谈及此书何以缺乏对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学艺术的论述时，曾为难地说道，“这是另外一种东西，完全不能把它放到欧洲的美感自相连贯的历史中来。”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①对此，他深感无能为力，只能寄望于其他人能“按照美学理论对这种艺术加以研究，那对近代的思辨一定会有可喜的帮助”。^②这种理论上的为难表明，一部分西方学者早就意识

① 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 页。

② 同上。

到，缺乏对中国以及东方文艺理论的了解和论述，对于他们的完整和全面的美学理论大厦的构筑，不能说不是巨大的遗憾。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和长期的隔膜，中西方文论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直到 20 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这种交流也仅仅是单向性的。较之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兴趣与了解程度，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缺乏理论兴趣，更缺乏了解。虽然这一状况在 20 世纪后期有了一定改变，但并不是根本性的转变。中西文论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互动，这也导致了中西诗学理论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始终难有大的突破。迄今为止，中西诗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走以西方理论为基点，来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阐释的路子。因此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一现状提出质疑，认为我们所进行的中西方文艺理论比较研究在入思的基点、延论的方法上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理论前提或结论均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立场上。中国传统文论在所谓的比较研究当中实际上处于缺席的尴尬地位。这样的比较研究结果就必然导致比较文学或诗学研究实际上成为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立场的消解。改变这种片面的消解性比较研究状况的声音近年来愈加强大。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动摇了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学科根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争议便是对中西方文艺理论比较研究的学科命名的讨论。

黄药眠与童庆炳两位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一书中认为：“比较诗学则指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何以不用‘比较文艺学’、‘比较文论’、‘比较文艺理论’而偏偏用‘比较诗学’呢？直接的理由固然是返回到古希腊的‘诗学’概念去，——由‘文艺学’、‘文论’返回到‘诗学’概念，包含着一个根本的意图：返回到原初状态去。原初并非仅仅指开

端，原初就是原本、本原、本体，因而返回原初就是返回本体。”^①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段话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们指出，“当‘中西比较诗学’论者将中国古代‘文论’名之为‘诗学’之后，他会不知不觉地按照西方‘诗学’模式选择、增删中国古代文论素材，从而虚构出一种‘诗学化的文论’，然后将其与西方‘诗学’进行比较。因此，所谓的‘中西比较诗学比较研究’往往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缺席情况下的比较研究。”^②实际上，这样的质疑所针对的不单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针对的是 20 世纪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文学理论方面，甚至可以推及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现代化转型上。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走的就是“西学基点，现代阐释”这样一种道路。也正是由于这一根本阐释立场的确定，我们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史被嵌入进西方理论话语所设定的范式中。

从总体上看，我们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一个共同的西方的理论前提，大都依据西方某一理论模式，首先确立一个文学或文学理论发展的总体性原则，由此来推演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进程。这种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典型西方理论思维模式，西方理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均习惯于先验地设定某种前提，如将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演化结果，或是从社会生产、社会关系之类的总体理论前提来认识文学艺术。我们的传统文学研究也大多依据这些理论前提的设定，来决定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基本范畴的筛选和阐释。在这

黄药眠、董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5 页。

些总体性原则和前提下，我们建立了文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或价值论等一系列的哲学和美学理论阐释模式。这样，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或诗学历史的书写便可以把诸如道、气、情、志、言、文、意、象等传统的文论概念纳入其中进行讨论。有了内容与形式的范畴设定，我们的理论便可以相应地对文、质、风、骨以及形、神等问题进行界说，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得以将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纳入到一个比较有体系的现代理论的框架中进行阐释，使中国传统文论能够得到系统的梳理。然而在今天，西方文论当中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基点建构起来的西方诗学理论大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前设性的总体性阐释模式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不断地被质疑、颠覆。那么，我们借以描述和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及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这一整套理论体系，也同样会陷入这样的一种理论前提误设的陷阱中。因此西方文论所产生的困扰，同样也会产生在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上，而且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上，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史的前提与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前提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使得我们的比较诗学的研究不断地产生一些根本性的争议。

目前，某些人们一直看作是自明的基本概念，在现在也成了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学科命名之争。这一问题的讨论使得这一学科的存在前提也遭到动摇。从我们以上简要地引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诗学，无论是在理论形态或是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均无法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因此，建立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前提是否成立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余虹教授在《西方诗学与中国文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之间差别是结构系统的，因

而无法通约。^① 并认为：“‘中西比较诗学’这一称谓在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思想文化差异，以及现代汉语语境中这两大词语的语义空间差异，独断论式地假定了‘文论’同一于‘诗学’（文学理论）的同一性。”^② 在此基本判断下，他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命名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详述，所提出的问题在国内也引起各方关注与论争，是比较诗学否定论颇有代表性的观点。余虹对中西诗学的否定性论断使得迈纳所希望的“确立众多诗学世界的原则与联系”以及刘若愚先生想通过比较研究来获得对“所有文学有一个更好了解”的努力似乎成为了难以企及的目标。

目前比较诗学研究成为问题的关键是对“回到古希腊去”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应对西方“诗学”概念的产生到基本含义的确定重新进行思考。迄今为止，我们对西方诗学或古希腊诗学起源发展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这也是重新思考中西诗学命名之争的关键所在。就目前的比较研究来看，中西方学者均共同地设定了比较研究的共同基点。例如，在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被公认为西方哲学也是西方诗学理论的起点。而在中国，儒家诗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诗大序》则被大多数学者当作传统诗学理论的起点。由此，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许多基本结论大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设定而作出的。设定这样的基本起点的目的是为了使中西文论或诗学的比较研究得以顺理成章地展开。例如，将柏拉图的文艺社会功用观同中国古代儒家的文学美刺与教化思想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将中西方文学观念纳入到文学价值论体系中展开。不可否认，二者之间也的确存在着共同点。但

①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 页。

② 同上书，第 3 页。

这样的比较实际上是将中国古代文论纳入到西方文论的价值论体系上。除了对中西方传统文学和文论阐释的方便外，似乎显得比较简单化，而且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至少它无助于我们从根本上了解中西诗学的基本理论起点，更妨碍我们对中西诗学深层次差异的了解。

从既往的比较研究看，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诗学理论是我们认识与比较中西方诗学的起点。同样，国内对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理论溯源一般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身上。当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既是西方哲学和诗学理论的起点，也是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理论的归结点，以他们的理论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点并无不可。但作为诗学概念的形成发展研究，我们的研究则有必要前移。从歌与诗的具体实践活动发展过程来研究诗的概念的形成，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诗学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同时对中西比较诗学的讨论或许会有所帮助。让·贝西埃等人主编的《诗学史》就指出，在“系统而又明确的诗学之前，似乎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思考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思考诗之性质、目的及其在人类活动中特别是智识学科中的地位，思考诗——及诗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思考美及其在最高价值中的地位，思考诗的构成体裁、形式和手段”。^① 作者认为，这就是事实上存在着的与有系统的明确的诗学相对立的，而且其重要性丝毫不逊色的“潜在诗学”。实际上，在以古希腊哲学为起点的西方诗学理论体系建构起来之前，古希腊的诗学研究的对象一直放在神话、史诗等文学作品的类种差异的研究上，特别是对诗歌的表现形式研究非常的细致。从根本上

① 让·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讲，古希腊哲学、道德伦理等诸多理论最基本的概念均起源于神话与史诗的研究。这就是西方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知识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源于神话、史诗，最后走上形而上的哲学理论建构。这就造成了西方诗学与哲学始终缠绕在一起的情况，这一点是中国传统诗学研究所没有的现象。正是这一根本话语形态的差异影响着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从源头上重新进行梳理，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和欧洲，或是世界上其他民族，他们的文化思想的基本起点都具有同源性。无论是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或是文学艺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均有共同的神话研究的前提，这一共同特点，也是我们对中西比较诗学命名问题探讨中首先应当注意到的问题。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问题，诗是以神话和礼仪为中介而与日常语言相分离的，古希腊的情况不应成为例外”。^①所以说，诗学命名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在我们对西方诗学研究的起点确定上。以往的诗学发展史研究大都选择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起点，这样我们对诗学问题的比较研究首先就局限在他的形上理论范畴之内，并将其作为共有的理论基础来对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传统的西方文论的发展来看，西方人对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跳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逻各斯中心的哲学理论框架，诗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成为了哲学问题。这种特有的理论话语形态使得中西传统文论的比较研究十分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在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找到可以切入的理论共同点，我们的比较研究才能建立起一个共同的理论平台。

如果我们能离开诸如理式这一类形而上假定性的前提，将研

^① 让·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究视点前移，重新从根源上认识西方文论，就可以对源于古希腊“诗”（poetry, poem）和“诗人”（poet）的概念重新进行辨识。

“诗”的概念在古希腊时期是到了公元前 5 世纪后才被广泛使用的。此前古希腊人普遍使用的是更具有更多音乐元素的“歌谣”（song）这一概念来区分与日常生活当中的言说。为了明确地表述这音乐性的和非音乐性的两种话语之间的区别，希腊人更多地使用“歌咏”（avode）“歌手”（avodoi）来表述最早的诗歌以及相关的问题，而非后人普遍使用的“诗”或“诗人”。这是由于古希腊最早的文学活动均产生在各种社会和宗教活动的场合，宗教活动场合的表演性（performative）活动所致。古希腊人的诗学概念形成经由了由“歌”到“诗歌”再到“诗”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古希腊人由表演性歌舞合一的技艺，发展到纯粹的文学或诗，再从中产生具有浓郁哲学色彩的诗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便是这样一种文艺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演变的最后实现者。与此同时，由于文学艺术与哲学理论的原生性关联，古希腊的诗学观念便呈现出哲学与文学艺术理论的相互渗透，哲学讨论的问题与文学艺术应当讨论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哲学的命题同时也成为文学艺术探讨的问题。这一状况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到康德，才对文学艺术与哲学边界问题作了一个较为初步的清理。尽管康德将文学艺术与哲学之间的边界作了理论上的廓清，但他始终是将其放在哲学范围内展开他的讨论。到黑格尔，这种状况更是如此，文学艺术被当作绝对精神外化过程当中相对低级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因此在西方，文学艺术是被放置于哲学的范围内被解释的。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也一直在延续。它对于我们所致力于建构的中西比较诗学的影响巨大。这也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出现问题的最深刻原因。要改变这种研究状况，需要我们选择合适的角度，避开西方诗学理论所设

定的范畴牢笼，重新审视中西比较文论或比较诗学的研究。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或确认中西方文论所共有的范畴，找寻二者之间共同的理论基点，寻求中西诗学的相互融通。

20 世纪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视角。“意象”派诗歌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诗歌的解困既然可以从中国古代诗歌中获取养分，那么，这也可以证明，中国的古代诗学理论也同样具有西方文论所不具备的独特理论特色与价值。虽然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有很大的误读成分，但从现代西方诗歌创作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新天地，可以与他们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相互借鉴、融通。英美意象派诗歌创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说明，中西文化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可通约的。无比较、无借鉴即无交流。包括比较文学和比较文论研究在内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寻求不同文化间的交互性研究。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从比较中找到中西文论之间的相互包容性或互补性，那么比较文学或文论的学科研究就毫无价值。事实上，中国现代文论已经证明，中西方文论的交融是不争的事实。但很可悲的是，西方文论显示出它的强大兼容性，几乎是从整体上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同样，中国文论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包容性，容纳了从整体理论思维模式到重要术语概念的全盘西方理论的置入。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样的比较研究继续像 20 世纪中西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研究那样，只能放在西方文化或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层面上，寻找中国现代文学或文艺理论的西方理论资源，单向性地着眼于西学东渐的历史事实研究，那么这种研究总是沦落在对这样或那样的舶来之物的理论接受和阐释之中，只能进一步弱化我们的文艺理论自身的独立创造意识。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比较研究的价值。从

另一方面看，人们建立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不要仅仅指出不同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最粗浅的哲学理论也会告诉我们，差异是绝对的，差异是世间万物之间关系的普遍性或本质特征。我们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研究当然是从差异性着眼，但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永远是存在的，仅就差异而进行比较，永远无法成为我们的文化或文学比较研究的目的。实际上，西方文化就是异质性的“两希”文化融合的结果。而比较文学或诗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异质性与同质性之间的辩证性转换关系，以及二者间的相互融通。理论上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思维模式只能让我们的比较研究陷入更深的困境。

因此，认定中西方传统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进而依据“诗学”的西方定义认定，中国古代“诗学”这一学科的命名是成问题的，这一结论也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古代传统文论是否能视为“诗学”的理论质疑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刻思考。

我们也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言说语境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还原性阐释都是难以企及的理想。无论是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论，或是西方文论来说，均是同样的。实际上，无论是对比较诗学学科肯定或是质疑，双方的论争的理论前提仍然是在古希腊哲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论传统，他们所设定的形上思维角度始终没有摆脱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局限。从根本上讲，中国古代文论一路发展而来，其间也同样经历过深刻的理论改造和更新。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言说，我们就肯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这样或那样的理论模式中来匡解前人学说，无法达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境界。我们始终感到不满，深加诟病的是，我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的阐释，或是建构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始终是筑基于西方诗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阐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与西方诗学理论发生和发展前提条件的比附基础上的理论推断，这

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自身特征。这是我们现在仍然无法摆脱的困境。因此，中西文学理论的所有差异自然可能导致这样的结论：所谓中西比较诗学是一个前提性的错误假设。或者说，这至少是一个有待于深入讨论的问题。对比较诗学命名的讨论，无论是将其命名为诗学或文论，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是对中西比较诗学深入探索的推动。因为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命名问题，而是对这一学科研究基点、研究方向等相关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对于古代传统理论的解释都是，而且只能是一定视域里的“现代”阐释，那么我们便完全可以或必须摆脱学科命名问题的纠缠，在现代意义上重新确立比较研究的基点和方向，以阐释的有效性来证明中西比较诗学的学科命名的合法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诗学”或“文论”或“文学理论”的概念，均可以成为比较文论或诗学的学科合法性前提。比较研究中的“诗学”概念应当是广义性的，从现代英语的角度看，Poetics，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主要是指：研究诗歌的本质、形式和规则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that deals with the nature, forms, and laws of poetry）；或是，对诗歌或美学的研究或专论（A treatise on or study of poetry or aesthetics）；其三是指：诗的创作实践（The practice of writing poetry; poetic composition）以及诗歌和文学的语言学研究（The study of linguistic techniques in poetry and literature）。^①“诗学”的这一现代基本定义可以帮助我

本文所引英语术语定义是在参照了《新牛津英语辞典》、《美国传统辞典》、《朗曼辞典》等辞典的解释后所归纳出的，具有通识性的普泛定义。未采用西方某些文学理论专著的定义，因为那些专业性的论著对此所作出的定义往往是撰写者依据自身或某一流派的理论学说作出的定义，这往往会使问题被复杂化。

们做如下的归纳：广义的诗学是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的本
质、语言形式等诸方面的美学研究。因此，诗学研究的范围应该
包括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各类文体。这一广义的诗学概念虽然始
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其范围广泛地涉及史诗、戏剧等广义的文
学研究范围。而“诗学”或“诗”之学真正成为文学研究的现代
学科在西方也是较晚的事情。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始于诗歌研究
以“诗经”之学开始，经历了广义的文章之学，再归结到诗歌专
论。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进而旁及到戏剧、小说等领域。在较
晚的明清时期，得到更深广的拓展，逐步具有了同西方诗学研究
同样的研究领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基本具备了与西方文学
理论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内涵，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诗学概念使
用上称中国传统文论为诗学，并以此作为中西诗学研究的共同基
础。另一方面，中国诗学不仅指古代传统文论，也包含近现代文
学理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当中，中国文论与西
方文论经历了逾百年的融合与借鉴，诗学已然形成了具有现代义
域所能包容的称谓的所有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用“诗学”概念
来描述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理论上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当然中西诗学或文论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
许多地方的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古希腊形而上学之风的盛行，
使哲学理论研究形成体系的时间比较早，一开始便能将问题的研
究相对地集中起来，使雅典这一狭小的城邦社会，和相对集中的
知识群体能迅速奠定理论研究的基础，开创了师承相继的理论发
展路径。由于哲学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因而能够从中间
孕育出系统的诗学或美学知识体系。中国传统理论研究相对而
言，其发展的地域空间分布较广，知识群体相比也较为分散，理
论呈多元的发展状态，且理论资源也较广杂。就哲学理论而言，
春秋战国时代便有诸子百家之论，几大学派较之古希腊哲学，也

未能更好地集中、渗透、融合。就儒家一派的文学艺术观念的发展而言，便融合了六经之学，既直接产生于对《诗经》研究的批评实践，也融合了包括《易经》之学在内的各学科门类的知识研究。仅从这一点看就足以导致中西方文论截然不同的理论话语形态。但从根本上来讲，中西方诗学理论研究从一开始所包含的内容就十分丰富，其形态差异并不意味着二者间没有共通之处。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差异的根本则是在其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才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的比较研究完全可以从根本基点上找到相互融通的东西。比较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便是能在异中求同。所以我们首先应予以注意的是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二者理论所追寻的目标和入思的角度不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立论的目的是其哲学建构的一大组成部分，这一点从他们对神话、史诗和戏剧的研究当中可以看到。西方诗学源于叙事文体写作的研究，这就导致了对事物表述中的真实性的思考。这也是古希腊文论何以从追求艺术与表述对象之间一致的模仿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它关注文学艺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当然，这也是文学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但这实际上涉及的哲学理论所关注的言说与世界、真理关系等形上命题，这样的理论入思方式必然导致其理论最终走入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哲学化，从而使得西方诗学在其后发展形成了它的理论上浓郁的形而上话语特征。虽然古希腊哲学家的认识差异也很大，但从根本上看，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论发展形态上产生出的差异，而在文学艺术的基本问题思考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二者之间的入思前提在总体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西方诗学理论的共同发展前提。诚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西方诗学理论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哲学思考的附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